



◎ 主编
水田宗子

『作品卷』

日本 现代女性 文学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46.31
581

『作品卷』

◎主编
水田宗子

日本 现代女性 文学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日)水田宗子主编;陈晖
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3
ISBN 7-5327-2464-6

I.日... II.①水...②陈... III.①文学-作品
综合集-日本-近代②文学-作品综合集-日本-现代
IV.I3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439 号

图字:09-2000-298号

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集

作品卷

(日)水田宗子 主编

尾崎翠等 著

陈晖 吴小莉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5 字数 293,000

2001年3月第1版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100册

ISBN 7-5327-2464-6/I·1441

定价:20.30元

本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水田宗子
编辑委员 高良留美子
 北田幸惠
 陈晖
 吴小莉

本书各篇译者

序言	吴小莉译
蟋蟀小姐	周祥崙译
小祝的一家	储元熹译
中国的盲士兵	陈 晖译
晚菊	可 夫译
残丑	陈 晖译
相似形	陈敦华译
兔子	高海宽译
山姥的微笑	陈 晖译
黄沙	吴小莉译
稻草狗	陈 晖译
锅中	高兰云译
入赘的狗女婿	张义素译
诗歌 33 首	卞铁坚译

序 言

水田宗子

初次接触日本文学的读者，都会为日本古典文学主要出自于女作家之手这一事实而感到惊讶。《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这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巨著就是由女作家完成的。她们所使用的是古典文学中常见的一种创作形式，即日记体来从事写作的。

女性在古典文学中所占据的显赫地位并不局限于散文。一百三十多位女诗人，其中包括许多能反映那个时代创作主流的诗人的诗作，都收录在日本最早的诗集《万叶集》里。这部作品汇编于八世纪，其中编入了受过不同教育和来自不同阶层的女性的作品。第二部最古老的诗集《古今集》，出现在一个世纪之后，与《万叶集》不同，其中只精选了一些有素养的女诗人的作品，同时，这些作品符合当时编辑者的审美观和批评的水准。同样，这些女诗人的诗作在各方面都可以与男诗人相媲美。事实上，像小野小町和和泉式部两位女诗人，是那个时期被公认的最有才能和最走红的诗人。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说过：从传统上讲，诗歌并不是一种最适合女性的表达方式，因为她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放置于宇宙的中心位置，并对此给予相应的解释。然而，以诗歌来作为表达形式的日本古代女诗人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了这一论点。

日本女性在《万叶集》时代的引人注目的创作力，无疑是与她们当时所处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及享有的自由分不开的。然而，到了平安时代(794—1185)，由于佛教的盛行和封建势力的桎梏，女性被排斥出政治和经济领域，并逐渐退回到家庭中去。即便如此，她们在古典诗歌创作的领域里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并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里，一个原因是诗歌只被定义为短小的抒情诗——和歌或短歌，并成为被社会所接受的表达爱情的手段。然而，另一个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诗歌是用假名、即日语的音标来写的，而不是用官方文书所要求的汉字。假名体系，一般被认定为“女人文字”。对于男性来说，这种文字过于浮浅，除非用来写诗。尽管男性仍旧用汉字创作汉诗，但汉诗还是渐渐成了一种知识性的消遣，或者说是一种用来表达宗教思想的手段，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日本诗歌的主流——和歌。

日本的散文小说的发展与诗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介绍诗歌、诗体日记、民歌以及采用叙述故事的传统形式的口头文学的长篇序言中，出现了小说这一体裁。古典诗歌的个性化和抒情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在散文小说中。诗歌小说(歌物语)和诗体日记成为古典文学中的主要小说体裁。这两种体裁都擅长对内心世界的描写，同时又都是女作家以假名的形式写出来的。由此可见，日本女性无论在小说创作上，还是在诗歌创作上，都处于主导地位。

弗吉尼亚·伍尔夫观察到，小说是适合于女性创作的体裁。她认为女性是特别敏锐的观察者。她的这一论点，对于日本女作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在失去了参与社会生活和自由表达的渠道之后，她们在家庭生活的狭小环境里，视野变得更加狭隘。在古代的日本，女性是叙述故事的主角。她们是民间传说和口头文学的主要传播者。现在日本被保存下来的最早一部作品的传播者叫稗田阿礼，据说是位女性。她被指派讲述从神话时代起的民族历史故事。一位叫作太安麻吕的著名男性汉学家，将她讲述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并整理成书。

在一种近似于小说的独特的叙述故事的形式——物语的出现和

发展过程中,女作家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在平安时代,对于贵族来说,教育是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主要手段,尤其是中下层的贵族,他们在教育孩子上都下了一番功夫。尽管女性被排除在科举考试制度之外,她们没有像男性那样接受严格的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学的教育,但当时的这种风气还是令她们受益匪浅。

由于宫廷雇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来担任家庭教师、陪伴皇后以及充当女官的职务,因此,中下层贵族家庭也非常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来教育他们的子女。宫廷中的女性沙龙以出色的女诗人和音乐家为中心,她们之间彼此竞争,因而提高了她们艺术和文学的造诣。然而,在物语的发展过程中,正像和歌的发展一样,运用日记语言的假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因素。就如乔叟用英语而不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用的拉丁语从事写作,从而建立了英国文学的新传统一样,女性用假名写出的作品,成了日本文学传统的核心。

然而,尽管女性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显著,但她们的社会地位在整个平安时代却始终处于下降的趋势,最终到了完全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地步。这一现象是封建时期固有的特征。女性被禁闭在家庭环境中,特别是备受普遍存在的一夫多妻制之苦。但是,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上受过良好教育,对人类错综复杂的情感和关系有深切的理解,却被剥夺表达自由的隐居在上流社会的女性们,仍然记录下了她们自身的痛苦以及发生在她们身边的生活悲剧。

物语中最原始的一种典型形式是女性爱用的诗歌日记,它把对爱情和浪漫生活的现实主义和小说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以批判的眼光来描写人世间的悲喜剧。在男性用汉字记录着官方的公开文件和历史的同时,女性们则抒写她们的个人思想、感情以及她们身边人物的生活。她们以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倾诉和抒发情感和内心世界。这种对心理有透彻的理解的个人自传性写法,是现代普通小说这一重要创作体裁的雏形,这一点在日本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尤其突出。

《源氏物语》融合了史诗、悲剧和抒情诗的成分,这部作品的作者紫式部是最早在小说方面最有影响的女作家。诗体日记《蜻蛉日记》

的作家,她被断定是道纲的母亲,是宫廷里职位很高的女官。在她们的作品中,显示出女作家们在与困境抗争和坚定信念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关于物语和历史的区别,紫式部曾经说过,物语既涉及成功者和伟大人物的人生经历,也描写那些软弱的社会上的小人物。除了先前捏造的一些浪漫故事之外,《蜻蛉日记》的作者曾表明,她只是试图表现生活的本来面目,展示平安时代富有女性的真实生活。她首创了文学日记的形式,这是一种以心理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写作体裁。

由汉文和假名组成的日本文学这一双重结构,很明显是根据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来划分的。男人用假名写和歌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当贵族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衰退时,他们变得很怀旧,又回到平安文学的传统上去了。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对古典作品的抄袭,明显地保留了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独特的传统形式。在江户时代(1603—1868),当商人阶层开始成为文学最主要的资助者时,小说是以假名来写的,但总的来说,以汉字和中国方式写作的男性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现代日本开始转向西方,把西方文化作为认识的来源,并从中国文学的影响下解脱出来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承认女性流派文学是一种不同的写作形式,使得女性的文学作品更加容易被接受。她们的表现手法也与西方不同,甚至胜过西方。在整个古典时期,受过教育的女性一直写诗歌、物语、日记以及忏悔自传。然而,到了中世纪,甚至到了江户时代,社会制度由新儒教学说控制,女性完全退回到家庭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当封建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女性便停止了写作,她们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沉默着,渐渐失去了在文学领域的地位。由于以男性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武士政权的确立,古典女性文学活动实际上消失了,直到江户晚期一些对压抑文学的儒教思想不满的学者发起民族文学运动,女性文学才得以复苏。

女性流派文学完成复苏是在明治时期(1868—1912)和大正时期(1912—1926)。这是因为那时对现代化的追求和人权运动的影响,唤起了女性认识自我及表现自我的欲望。尽管明治时期现代法律制

度已经取代了封建制度,但法律仍然剥夺了女性几乎所有的主要人权。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人权运动的发展,这一切使优秀的知识女性越来越密切地关注她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身分。

明治时代对现代化的追求,是强调生活中实用主义的一面,而把文学放在边缘的位置上,认为作者和艺术家是无足轻重的。由于作家和艺术家被社会所忽视并被孤立起来,因此他们建立了只有他们自己的小型而亲密的世界——小剧场。在那里他们能够进行艺术实验并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生活,而不受旧的保守主义及实用主义思想的限制。他们所忍受的被孤立的痛苦,却使他们追求并接受了世界上最激进最前卫的思想,因为作家和艺术家们总是站在追求纯粹的新思想的最前线,也因为文学和艺术处在主要的社会活动之外。对有志向有才华的女性来说,文学和艺术是最适当的领域——事实上也是唯一的领域,她们能够在这一领域中寻找自己的梦想、成功。建立于一九一一年的蓝袜子文学组织,后来很自然地成为日本最早的女性主义组织,并出版了第一本女性文学杂志。蓝袜子组织吸引了许多主要对表现自我感兴趣的女性,她们出的杂志很快就变成了涉及所有的女性问题的女性主义论坛。

在明治、大正时期,女知识分子和女艺术家们像男知识分子和男艺术家一样被现代自我这一问题迷住了。在易卜生这类作家的影响下,“新女性”作为合法的知识公民获得了承认。尽管在现实中,那些试图摆脱强加于她们的传统角色并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女性遭到了社会的排斥,但那个时期女作家笔下的人物,却在追求自我满足和自我表现过程中,为女性的解放而斗争着。

即使进入现代,日本女作家的组织仍被视为她们自己的内部团体,被文学界排斥在主要活动之外,她们的作品被看作是大河的支流,永远也不会融入日本文学的主流中去。但这一独特的现象本身,却有助于鼓励女性写作,为她们赢得了读者和市场。尽管日本女性在历史上占有相当高的文学比率,但是普及女子教育无疑是明治维新的最显著的功绩之一。女性文学流派是一个独立而被社会所承认

的文学体系，得到了具有悠久的辉煌传统和受过良好教育女性读者的热情支持。这样既避免了女作家与男作家进行激烈的竞争，又避免了文学批评中日益严重的性别偏见，为女性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女性文学的创立有助于促进女性教育，同时，这一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存在和被公认，又成为鼓励女性以文学形式来表现自我的决定性的积极的因素。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找到了表达自我和全身心投入现代生活的方式，那种与女性文学有关的自传体的心理描写的传统就变成了是一大沉重的负担，因为这种传统使她们只拘泥于涉及私人生活的狭窄的主题和题材。女作家们发现女性文学越来越具有局限性，评论家们却依然期待女作家在女性文学传统内进行创作。他们只接受那些典型的“女性”主题，如心理、女性神秘的内心世界、母性及女性性欲望，因为男性可以不必将这些主题纳入他们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到今天为止，日本文学评论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男性所垄断的，这是无可质疑的事实。

冈本鹿子就是最受男批评家赞赏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热衷于描绘她本人的女性性感和作为母性、处女性及性欲美的化身的形象。她对生活和作品的解释，渗透了女性原则的神秘色彩。这种赞赏，明显地反映出男性崇拜者对她的渴望。进而言之，这类偏见认为：女性不具备创造性和抽象思维，她们在处理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太主观，又太感情用事，她们不能理解与审美问题相关的理论。而这些偏见，导致女性失去了全身心投入的信心。

除了影响女作家作品文学价值的社会学因素之外，有关女性的基本概念，特别是女性原则的概念决定了女性想象和思维的特性，并在她们的作品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母性原则”对女性的想象和她们本身形成的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原则认为，女人应该是接近自然和生活的。女性即是生活的传播者，在接触主宰人类神秘的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时，女性也是社会中创造生活的力量。

“女性本性”或者是“母性”的神秘特性很久以来一直吸引并迷惑

着日本的男男女女。只有考虑到封建伦理道德时，强调母性才会是合情合理的。封建伦理学认为，母性对女人来说，是唯一合法的生存价值。但是，作为女性原则，母性则远远超出了社会的范畴。在当代，男性和女性在生活中受到的伤害和打击越多，他们就越把母性作为避风港，并把具有母性原则的女性吹捧为母亲女神。然而，孰不知母亲女神这一概念，却只是“魔女”这一概念的翻版。

在佛教文化的巨大影响下，受社会压迫的人们总是相信借助灵魂再生和生命永恒来寻求救世的方法。像魔鬼的故事，其中包括形成日本丰富的怪诞传统艺术的核心能剧，它表达了受压迫和受虐待女性的思想情感和她们想要说的话。此外，像《蜻蛉日记》这种传统作品及《源氏物语》中的六条御息所里的人物忏悔的描写，也都试图通过塑造这一类“魔女”形象来展示受虐待女性的仇恨和报复的欲望。与贤妻良母相对照，邪恶堕落的女性形象和残忍复仇的魔女形象也成了永恒的主题。

像西方女作家一样，现代的日本女作家发现女性精神的潜意识王国是探索和重新定义“女性原则”及确立女性身分的极其关键的领域。圆地文子和大庭美奈子认为挖掘这一领域并再现过去的生活是最根本的。蓄意渲染中世纪的习俗，并把现代女性精神和古典时代受虐待女性精神相提并论，是现代作品的一大明显的特征。

在战前甚至当代，女性作家偏爱以女子学院文学的传统进行写作。她们很自然地探究爱情心理、女性性欲望、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中错综复杂的情感。她们往往受到理想女性形象的影响。这种理想形象在东西方传统中长期地受到赞赏，甚至在今天还渗透在流行小说和电视节目里。

然而，编入这本选集的作家的作品，由于涉及并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在描写女性现实生活时，很容易受到席卷全国的当代政治、哲学和美学思潮的影响。

女作家们在反对战争、反对原子弹爆炸以及反对阶级和性别压迫中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她们也描写在帝国主义阶段，生活贫穷的劳动阶层中的男男女女的普遍困境，预想着解救他们的途径。然而

事实上,大多数作家都不属于那个阶层。一些人参加社会主义革命,非常严肃地辩论文学和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她们为拓展现实主义的创作做出了贡献。宫本百合子、平林泰子、佐多稻子、林芙美子、大田洋子和林京子等作家的作品清楚地证明了女性作家的社会意识。

另外一些作家描写女性在新的生活方式中生活的可能性,并把它看作是将女性从强加给她们的传统社会性角色中解放出来的手段,而从根本上对母性及女性原则之类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这些作家冒着被社会排斥的危险,投身于寻求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对这些作家来说,摆脱依赖的角色,从传统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的这种做法,并没有被社会所接受。例如出现在宇野千代、林芙美子、富冈多惠子和村田喜代子作品中的人物,她们作为现代的女性追求一种新的身分和新的生活方式,同时她们又对生命存在的意义提出了疑问。

另一方面,包括高桥多佳子和河野多惠子在内的几位作家,敢于涉足异常心理、暴力和罪恶的世界。她们试图揣摩现代生存的孤独,抽象地探讨人类生命的根本意义。她们的世界有时变得很抽象,有时又有些古怪而隐蔽,类似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她们的大多数作品在小说创作手法上做出了有趣的尝试。

在流行文学作品中女性肯定是最受赞赏的中心人物。除了流行文学的作家之外,大多数现代女作家追求自我满足和获得认可的自我表现。她们的主人公最终是作为现代女性出现,而不是作为男主人公的附属品而出现的。她们有能力并准备承担社会和道德的重任,重新解释现代世界的女性主人公。

在这一观念上,现代日本女作家不是弗吉尔尼·伍尔夫所定义的小说家,那些小说家们是远离社会生活,只描写她们观察到的人和生活。而现代日本女作家则是在不懈地追求自我的过程中,真实并积极地投身于现代文学的世界,她们有时作为自信的新女性出现,有时却是以受伤和被伤害的形象出现。一些作家预想着新的社会体制和理想的未来,而另一些作家通过宗教、疯狂和自杀的形式,试图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对满足自我产生根本的质疑。现代文学把探索现

代人作为中心主题，她们的作品全面反映了现代文学的深刻性和局限性。她们在现代主义和现代文学史中占有着一席之地。

尽管女作家们全力投身于现代文学的主流之中，但是文学批评界还是对她们另眼相看，认为女作家最严重的缺点是她们形成思想、想象和表现的社会、历史及哲学力度的失败。在评价一个作家与自然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其他文艺思潮的关系问题上，与男性作家比较而言，认为她们很重要的一点是付出的努力不够。一般的女性被认为她们不仅生活在历史之外，而且生活在努力表现自我的现代男性之外。在今天，女作家仍然被划分为另一类团体（单独的组织及文学奖等等），并以与男性作家不同的尺度来评价其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她们充其量只是被隔离的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人物罢了。

在这本作品集中，我们试图选择那些既能反映女性作家投入现代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反映日本的现代社会和美学发展的作品。

我们的目的是要阐明她们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本着这样的意图，我们挑选出能反映女作家意识和观点的特性的作品。

由于文艺期刊成为女作家的主要媒介，所以她们一般以短篇小说的形式来发表作品。这种体裁比西方社会占据期刊统治地位的长篇小说更有意义。

除了林芙美子和平林泰子之外，这本选集中的大多数作家是非常多产的，并且以飞快的速度进行创作。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那些期刊杂志对她们的要求，这使我们从她们的作品中进行挑选变得非常困难。尽管我们选择了她们出色的作品，但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表明重要主题和创作倾向，我们也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没有选择一些名著。此外，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得不省略许多优秀而有成就的作家。

宇野千代和林芙美子是当代的女作家。宇野在成熟期仍然进行创作，而林在她四十八岁的一九五一年逝世了。她们是那些不能把写作和选择生活方式分开的女作家的极好的范例。她们爱过并且写了下来，她们的许多作品是自传体的。林出生于下层阶级的家庭，父亲是沿街叫卖的小贩，而她母亲在与男性的关系上比芙美子本人更

开放。她的作品经常以自传体来刻划具有自由精神和巨大生命力的女性。然而，她晚期的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出现在这本选集里的《晚菊》，是艺术精湛的纯文学作品。宇野千代在与他人的关系上也是很开放的，这成为她作品中着墨浓重的题材。她的这种写法使她的作品更着重对精神世界的挖掘，而不局限于对自我复杂心态的剖析。

宇野对人类心理的研究以及她在文体上的创见，这在她的作品，特别是在那些非自传体的作品中表现出来。这里引用一下她一九七七年的话，她有时用的方法是“雕琢每一个文字而不是写作”。宇野甚至通过把她的家乡方言和关西风俗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可能是最适合她的角色的特殊语言，这种语言在《阿繁》（1947—1950年）及她最近的小说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就像她在文学上是“文体家”一样，她在生活上也是“文体家”，她同时还是和服设计师、随笔作家。

与之相反，野上弥生子则作为能剧的知名学者的妻子度过了安静而平凡的生活。她丈夫属于小说家夏目漱石的文学团体。尽管她的生活很平静，但她还是涉足了当时的主要知识领域和道德问题，其中包括激进分子的活动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她的作品经常是以坐牢和拷问的方式，迫使那些具有激进政治观点的知识分子公开认错为结局。在她漫长的创作活动中，她始终在拓展文学创作的分野。她不停地写作，大多数作品是随笔文体，直到一九八五年她一百岁时为止。她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森》，描写了一位明治时期的东京少女，这是一部怀旧色彩浓重的半自传体作品，同时也是作者的一座寄托精神力量和永葆青春的思想感情的纪念碑。

平林泰子、宫本百合子和佐多稻子是日本战前左翼运动的重要成员。左翼运动反对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和在国内实行的阶级压迫。宫本女士是最有才华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她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作为人道主义者开始了写作。她对女性潜能的认识和她本人结婚和离婚的经历，促使她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小祝的一家》就是社会现实主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描述了一个从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女性，成长为一个对无产阶级和女性受歧视的历史有一定认识的成熟女性，并充满自信地生活下去。

宫本经历了多次被捕、受审查和政治迫害，然而，这些压力都没有使她改变初衷。与宫本不同，平林女士在意识上更倾向无政府主义，她与左翼运动和共产党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地通过她的丈夫。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都是在动荡的时代度过的。同时，作为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作家，她没有保持沉默，也没有被时代的嬗变和当局的压力所吓倒。《中国的盲士兵》是初具现实主义精神的感人的反战短篇小说，该作品不仅描写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而且叙述了无辜的日本老百姓被卷入战乱的状况以至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和宫本女士一样，她以多产的自传体小说确立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平林女士声称，战后她写的较多的是反映她个人生活的自传体作品。

佐多稻子也积极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然而，在她丈夫被捕后的第三年即一九三五年，她也被捕了。她屈服于压力，放弃了她的政治主张和活动，加入了由军事当局组织的作家团体，参观军事阵地并慰问士兵。由于参与了这些活动，战后她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尽管她于一九四六年再度加入共产党，但七年之后她被开除了党籍。创作于她脱党之后的《夜间的记忆》，坦率地涉及了战时与当局合作的主题。和宇野千代和野上弥生子一样，佐多稻子的文学生涯历经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以她对那个时代的往事追忆，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分量。

圆地文子也是在战前左翼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文学生涯的，但她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直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她才以一个颇有见地的探索女性心理王国的作家再度出现在文坛。由于对日本古典文学有很深的造诣，她将《源氏物语》翻译成现代日语。同时，她创造了一种反映女性心理世界的特殊的戏剧，把它与古代女作家创作的戏剧相结合并予以发展。

圆地文子在作品中，描写了女性在一夫多妻制下经历的没有爱情的失望、妒忌和悲伤。她通过对人间情感和心灵的敏锐洞察力，刻画了与能剧世界相似的哥特式世界。她娴熟地运用古典文学作品的构思作为她小说的基础，在《二世之缘》中表现出她对人类性爱的兴

趣。在这一作品里，小说的空间扩展至超越现代，描绘出了人类性意识在这一空间中的原始雏型。

大田洋子属于宇野千代和圆地文子那一代，但她的文学成就被归入战后作家群中，因为她的主要作品是描写原子弹爆炸及其受害者。她既描写原子弹爆炸带来的直接灾难，也描写了放射病及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恐怖和心灵创伤。她反对占领区的严格审查以及同心理疾病的斗争，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这些都具体地记录在她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半个人》一书中。该书收录的《残丑》表现了在损毁后的临时住宅里的蚰蜒的顽强生命力。故事的讲述者想赶走这些蚰蜒而喷洒敌敌畏，但一瞬之间这些虫子被杀死了，这使她想到原子弹爆炸的牺牲者，她也许不是有意识的，却成了攻击者。这一故事的讲述者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或者说社会应该为发生的悲剧承担责任。她的这一观点非常引人注目。而在她的作品问世之前，许多日本人只把焦点放在他们是受害者上，而很少涉及他们自己的战争暴行。大田女士直到一九六三年逝世，才停止了关于原子弹爆炸的写作。

河野多惠子和高桥多佳子的写作是在战争时期直至当代。她们也探究潜意识的世界和女性心理的王国，但是，她们两人都是以极其抽象乃至形而上学的方式来发展故事的情节。河野女士的作品很明显是以她本人的经历为主题的，特别是对怀孕的渴望。然而正像她在《蚂蚁云集》里描写的人类生存环境一样，她心目中女性和母性的复杂情感都展现在一个象征性很强的超自然的世界里。在她的视野里，疾病、不孕和死亡的阴影使人们丧失了理性。她作品中的主人公为得到真实的生命而被拉入异常的心理世界，在死亡和不孕的痛苦中挣扎，她的作品成了对现代化和对生命探索的一大讽喻。

河野多惠子的女主人公们被抛进一间传统的封闭的房屋或者是一幢房子，在那里她们追求性爱痛苦的快乐和虐待儿童的虐待狂的幻觉。这一行为可以被理解为通过扮演传统强加给女性的受虐狂角色，反映出一种企图得到性爱和女性自我的绝望。在河野女士的作品中，外部世界只不过是从小封闭房间的窗户里看到的景色而已。

高桥多佳子也把她的作品定位在一个超自然的不孕和异常紧张